

勘合贸易与日本茶道的诞生*

滕 军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以日本茶道为代表的日本独特的审美意识是日本文化艺术的精髓所在。关于其历史形成过程的研究尚不多见, 在日本国内的研究多重视与日本固有神学的联系。本文力图将日本茶道的形成过程放在中日交流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探讨发生于 15、16 世纪的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及其东渡的唐物对日本人独特审美意识发生的影响。

关键词: 勘合贸易; 唐物; 东山御物; 日本茶道

中图分类号: G13/ 17. 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9856(2009)01- 0091- 06

日本文化是受中国大陆文明的影响而发生、发展起来的, 其民族文化的形成比较晚。15、16 世纪是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时期, 茶道、能乐、花道、枯山水庭院等日本独特的艺术都在此期间孕育成熟, 日本独特的崇尚简约闲寂的审美意识也同时确立。在这一过程中, 由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所确立的唐物¹ 的价值体系及其审美意识是日本民族文化艺术形成的平台。也就是说, 日本的民族文化是在与中国文化的比较过程中形成的, 日本独特的崇尚简约闲寂的审美意识是在否定中国的崇尚豪华精美² 的审美意识中孕育的, 和物的价值体系是在与唐物的价值体系的抗争中诞生的。本文将就唐物与日本茶道的联系进行阐述。

一、对唐物的鉴赏引发和物的诞生

日本人对唐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重视数量到重视质量、从模仿唐物到创新和物的过程。

日本历史上的唐物风潮是从 14 世纪开始的。自南宋时期开始, 日本的民间人士大批自由地来华访问, 为日本列岛带去了大量的唐物。这些唐物被权势者占有, 成为他们炫耀身份的标志。一部

* 收稿日期: 2008- 11- 18

作者简介: 滕军, 女, 北京市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博士。

¹ 指 14 世纪至 16 世纪东渡到日本的中国精品文物。

² 这里对中国审美意识特征的描述只是为对应日本审美意识特征而言。

描写日本南北朝战乱时代(1336-1392年)生活的小说《太平记》(1371年)上就记载着这样一段纪事:主人公佐佐木导誉(1296-1373年)出自权势之家,为了展示自家的唐物收藏,他经常以吃茶会的方式邀请社会名流来家里鉴赏唐物。《吃茶往来》¹⁾中描述了佐佐木导誉家的茶会:吃茶亭的正厅悬挂有四幅中国画,中间的两幅是彩色释迦灵山说法图(为北宋画家张思恭所绘)、水墨观音普陀示现图(为南宋画家牧溪所绘),其两侧有普贤文殊像。其画像上的佛陀菩萨个个明眸丹唇,神态巍巍荡荡。画像前面置有一供桌,上铺罩锦缎。摆有寒山拾得木雕像、青铜花瓶、黄铜香炉及调香用具。

从这一则史料中可以看出,佐佐木导誉的所谓“吃茶会”,可称是一个唐物的展示会、鉴赏会。大约写于1331年的《徒然草》对当时的人们无节制地进口中国文物提出了批判:关于唐物,说起来除了药品之外没有什么非缺不可的。就像中国书籍,我们自己有那么多抄书匠,完全可以抄写复制。但一些商船不顾海难的危险,运回一些多余的东西,使唐物到处堆积如山,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

从《徒然草》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唐物数量很多,充盈市场,但档次不高。

可是,进入15世纪以后就不同了。勘合贸易为日本带去了中国皇帝拥有的最高级的唐物,这些唐物在中国都是一流的产品。¹⁾何况日本遣明使团简直就是一个唐物采买团,对北京及苏杭宁波一带的文物市场进行拉网式淘买,使得当时的中国工艺品的精品大量流入日本的室町将军^{o)}的公方御仓,凡是被公方御仓收藏过的唐物即为“东山御物”。^{»)}日本的唐物市场也从重视数量转为重视质量。到了15世纪下半叶,勘合贸易大权逐渐被大内和细川^{¼)}掌控,优质的唐物不再大量进入将军府。1523年的宁波争贡事件^{½)}以后,明朝廷不再给日本遣明使大量的优质唐物。但这种情况反而促进了日本人对东山御物的整理、鉴赏、研究的深入。

由能阿弥、相阿弥两位唐物侍奉官整理的东山御物指南书《君台观左右帐记》就是这一时期日本唐物鉴赏活动的最高成果。被《君台观左右帐记》推举为“上之又上”的画家有:王维(擅人物、山水)、宋徽宗(擅人物、花鸟、鱼虫)、李公麟(擅马、佛像、山水、人物)、徐熙(擅花木、禽鱼、蝉虫、蔬果)、赵昌(擅花果、折枝花、虫草)、易元吉(擅花鸟、水禽、山禽、獐、猿)、玉润(擅山水)……(略)。如上,能阿弥在《君台观左右帐记》中能举出177位中国画家,并且能记录下各位画家的擅长画题,还能鉴别出良否。这说明将军府上的中国绘画收藏有相当大的数量,将军及文化侍从们对中国绘画的认识领会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足利将军府上的唐物侍奉官们在鉴赏唐物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体味唐物的艺术形态和内涵,并逐渐开始模仿唐物,创作新唐物。能阿弥、艺阿弥、相阿弥祖孙三代就在水墨画上成就非凡。先后留下了《花鸟图屏风》、《白衣观音图》、《观瀑图》、《山水图》、《潇湘八景图》、《庐山观瀑图》、《月夜山水图》、《黄山谷图》、《腹摩布袋图》等高水平的新唐物。¹²⁾

不仅是唐物侍奉官,在足利将军府的家臣当中也有在鉴赏唐物、创新唐物中留下成就的人物。雕漆唐物鉴定家族“雕漆杨成”就是其中的一例。《日本国史大辞典》记载:雕漆杨成家族代代擅长雕漆工艺品的鉴定、制作技术,其初祖长充侍奉室町幕府第二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367年在

¹⁾ 特别是漆器,因永乐皇帝喜爱漆器,在京城开设皇家专用作坊,其产品多用做下赐品。所以,日本多有收藏,反而中国少有收藏。

^{o)} 将军是当时日本的最高统治者。

^{»)} 最著名的将军府邸坐落在京都的东山。

^{¼)} 细川和大内均为当时的战国大名,1467年至1573年为日本的战国时代,室町幕府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½)} 细川和大内为争夺与明朝的贸易优先地位,在宁波发生争斗。在争斗中杀死了中方军民,烧毁了中方房舍。

位),因其制作的雕漆不亚于中国元代的雕漆名匠张成、杨茂,所以取张成、杨茂各一字,称为“雕漆杨成”。至第三代传人长贞,受足利义政将军之命,制作出了不少雕漆工艺品,为天下所知。^[3]至今,雕漆杨成的真正作品无法考证,但可见5封雕漆杨成的亲笔唐物雕漆鉴定书。^[4]

不仅是足利将军府上的唐物侍奉官和家臣,担任唐物修理的工匠中也出现了新唐物的制作者。羽田五郎是15世纪后半期的漆器修复工,住在室町时代最大的禅寺相国寺前的法界门附近,经手修复了许多东山御物及优质的雕漆唐物。在日本茶道形成的初期,茶道独特的艺术形态需要独特的道具,在唐物无法满足其需求的情况下,羽田五郎独创了用于盛装茶粉的黑漆薄茶器和用于浓茶器托盘的黑漆四方盘^[5],开创了日本人制作和物的先例。

关于唐物的修复,在唐物青瓷上也有史例。12世纪后半叶,日本当时的武士阶层头领平重盛曾向中国宁波阿育王寺施舍黄金,阿育王寺的长老拙庵德光作为还礼,赠送给了平重盛一只龙泉窑中的精品青瓷茶碗。这只茶碗东渡后受到了日本人的无上喜爱,至15世纪后半叶,传到了当时日本的最高统治者足利义政的手里。可是,碗的底部和壁部已出现了裂纹。足利义政感到十分惋惜。他托人将此物拿到中国,希望中方能按原样再做一个同样的茶碗,但15世纪的龙泉窑已不再生产同类的产品,中国师傅只好用锯子把裂纹补好后还给了足利义政。

在此形势下,日本人不得不开始制作自己的和物。可以说,日本人对唐物的鉴赏引发了和物的发生。

二、一部分唐物演化为日本茶道的茶道具

15世纪末,在唐物鉴赏活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一种新型的唐物鉴赏会——茶会诞生了。茶会为唐物的鉴赏带来了新的方法和新的享受。在以往的唐物鉴赏会上,客人们只能观看文物的形状、花纹、颜色,而不能捧在手里感受文物的内质,玩味文物的韵味。但在茶会上就不一样了,客人可以把茶碗、茶托、香盒等拿在手里尽情地爱抚,并可以就手中的文物提出种种质疑与主人研讨。这些比起单纯的唐物展示更能满足主人的展示欲望,又能让客人尽享唐物之乐。事实上,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日本人就是通过这种茶会活动来获取文物知识的。有的客人专为看唐物而来吃茶,有的客人在茶会散后马上掏出纸笔,把刚刚在茶会上见到的唐物素描下来或用文字记下,以此来积累自己的唐物知识。千利休¹就留下了这样的素描。在那个时代,衡量一个茶人的最主要的标准是看他见到过多少唐物。日本茶道的“意不在茶”的特点在其形成的萌芽期就已显露出来了。

还应强调的是,茶会为日本人鉴赏唐物提供了一套合理程序。比如,茶会的第一项内容是添炭,客人们就来鉴赏茶炉、茶釜、炭箸、灰勺、香盒;第二项内容是用餐,客人们就来鉴赏饭碗、菜碟、酒杯;第三项内容是吃点心,客人们就依次鉴赏点心盒、点心盘;第四项内容是吃茶,客人们就可以鉴赏到茶碗、茶勺、黑釉茶罐等。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唐物是依次上场、依次下场的。因而主客们的目光是可以集中在一个唐物上并就其展开深入研讨的。这比起以往的走马观花式的鉴赏方法来说,客人们可以鉴赏得更加细致深入,更加有滋有味。

随之而来的便有茶道具的精品化。试想如果主人有10个香盒而只能在茶会上展示1个的话,主人当然要再三遴选,取其精品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日本人所需唐物的小型化,凡是适合拿在手里把玩的、与茶会有关的唐物价格便飞涨起来,而与茶会无关的大型香炉、大型花瓶等反而受到冷落。随之而来的更有日本茶具的古董化,这样的茶具可以在茶会上引出更多的故事。就这样,在茶会

¹ 千利休(1522-1592年)是日本茶道的大成者,日本审美意识的奠基人。

上出现的唐物有了一个新的代称：茶道具。

至16世纪末，在唐物茶碗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在唐物茶碗的形状不适合日本点茶法¹的情形下，千利休创制了碗底宽、碗壁厚的黑釉乐窑陶茶碗，宣告了日本“和物”的正式诞生，日本茶道也同时宣告成立。随后，千利休又利用本地的材料和技术指导创制了竹花插、黑漆茶盒、素烧陶花瓶等适合日本风情的茶道具。这些和物与唐物一起构成了沿袭至今今天的日本茶道具群。

三、唐物侍奉官的角色演化为日本茶道中的茶人^o

足利幕府自建立以来，就在将军府设有“文化侍从”一职。文化侍从们均为男性，统称“阿弥”。阿弥本是对时宗^o僧侣的称呼，因室町幕府将军本身属武士阶层，晚年几乎都出家住寺院，所以，其侍奉者必须冠有武士或僧侣的头衔。其实，阿弥群体的身份很复杂，他们是应将军文化生活各种需要的各种人才。平日里他们负责将军府上的摆宴、点茶、陪酒、插花、布置房间等杂勤，当将军巡幸或有歌会时要陪同将军评古论今、赋诗做画。历代将军身边都有十几位这样的文化侍从。

在所有的文化侍从中最为出类拔萃者会被任命去管理唐物，也称“唐物侍奉官”。他们负责唐物的收藏、保管、鉴别、裱装、出纳、摆饰。而这一类唐物侍奉官本身又是唐物的持有者，有经济实力的人。志贺太郎就指出：善阿弥是东山御物水墨画《雪景山水图》（梁楷作）的物主；珠阿弥参与日朝贸易，用所获利润援建了高野山金刚峰寺的西塔；能阿弥曾提供资金协助东山御物佛画《山王灵验记绘卷》的修复。^[6]另据家智子的研究，能阿弥·艺阿弥·相阿弥家族曾做过今西宫庄园的领主，所获利益支持了他们在幕府的文化活动；相阿弥曾从经济方面参与过大德寺方丈的壁画制作；阿弥们在陪同将军巡幸大名馆邸，或为大名馆邸指导唐物鉴定、唐物摆饰过程中曾得到过报酬。^[7]可以说，这些具有经济实力的、拥有唐物的阿弥们在为将军的唐物侍奉中获取了更多的文物知识和更高的声誉，这些软性的收入在社会上可以换回更多的硬性收入，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被推崇为日本茶道之祖的村田珠光（1423—1502年）20岁时因厌倦寺院生活而逃离寺院。他做过包括买卖茶道具在内的生意并获得了成功，又因精通唐物而扬名。他虽不是将军府的正式唐物侍奉官，但与将军府上的唐物侍奉官能阿弥、相阿弥有过交往，并向两位阿弥学习过插花，还通过能阿弥的引见在足利义政面前点过茶，并通过上述关系见识到了将军府上最为高档的唐物。珠光还频繁地参加茶会，开始时他被安排在末席，可是由于他唐物知识的广博，不久便被人们尊为上座。他与名盛一时的一休宗纯和尚（1394—1481年）有过密切的交往。珠光从一休和尚处得到了珍贵的唐物——圆悟克勤的手书，这是流传至中国的禅宗和尚手书中最早的一幅。一休死后，一休的弟子们合资为师傅建塔，珠光为最大的出资者，由此可知珠光的经济实力。

珠光虽然不是足利将军府上的正式的唐物侍奉官，但他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履行了一个唐物侍奉官的职能。由于在15世纪末期，唐物鉴赏会逐渐演变为茶会，珠光被后世的茶人认定为了日本茶道之祖、茶人。

被推崇为日本茶道中兴的武野绍鸥（1502—1555年）生活在室町幕府势力衰败、战国枭雄织田信长（1534—1582年）称霸日本的时代。由于将军府的没落、东山御物的散佚、茶会的兴起，唐物侍奉官无从产生，唐物文化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位于中日贸易窗口的^o市人收藏了占日本全国总数44%的精品唐物。^[8]而武野绍鸥即是^o市的首富、最大的唐物收藏家。由于武野绍鸥拒绝

¹ 日本茶道用高约12公分、宽约7公分的茶筥在茶碗里将茶粉与热水搅拌饮用。

^o 在这一小节里，多处参照了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 13世纪形成的日本净土宗的一个教派。

向织田信长进献唐物和屈尊做织田信长的茶头而被织田信长置于死地，并被没收了家产。所谓的家产即是日本最精品的唐物。由于这一时期的唐物主要用于茶会，武野绍鸥也是鉴赏唐物的名手，所以武野绍鸥被当作日本茶道的中兴、茶人。

而 市的另外几位富豪、唐物的大收藏家千利休、津田宗及(? - 1591 年)、今井宗久(1520-1593 年)却甘做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1536- 1598 年)的“茶头”。所谓茶头并非是每日侍奉在主子身边的茶博士，而是一种臣服的象征。茶头们只是有义务将自己持有的精品唐物随时供主人欣赏并经常参加主人的茶会。实际上，这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独取天下精品唐物的一种方式。同时，茶头们又都是经济实权派，掌握着日本军火物资的调配权(津田宗及就曾负责过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的军火物资筹备事宜)。所以，织田信长与茶头们的关系实际上是武力与财力、权力与金钱的协作关系。茶头与唐物侍奉官相比，他们与主子的关系不那么紧密，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他们的职责内容仍与唐物有关。由于这一时期的唐物已演化为茶道具，因此千利休、津田宗及、今井宗久也被称作了茶人。

1592 年，丰臣秀吉赐死了千利休，同时，具有完全独立意义的、重视唐物鉴赏过程中行为艺术的茶人便诞生了。

四、鉴赏唐物的行为艺术演化为茶道艺术

在日本，出于对唐物的崇拜，唐物鉴赏会上的唐物摆饰很早就受到了关注。在《君台观左右帐记》(1476 年)的第二部分就记述了有关唐物的摆饰规定。大体分为 3 项：(1) 壁龕摆饰法；(2) 长条案摆饰法；(3) 多宝阁摆饰法。其所指出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

● 在壁龕上挂画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 1、如果挂 3 幅或 5 幅 1 组的画，则前面要摆饰三供物(花、烛、香)；
- 2、如果挂 4 幅 1 组的画，则前面正中要摆饰 1 只香炉，两侧要摆花瓶；
- 3、如果挂 2 幅 1 组的画，前面则只摆饰 1 只花瓶。

● 在长条案旁的柱子上挂饰物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 1、如果长条案上方吊挂有唤钟，则柱子上应挂敲钟的小锤；
- 2、如果长条案上方吊挂的是香笼，则柱子上不能挂敲钟的小锤，而要挂别的东西；
- 3、在柱子上挂饰物时，应挂在面向唐物摆饰的柱面上。

● 在多宝阁上摆饰物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 1、上层应放建盏，一定要配上雕漆的碗托；
- 2、中层应放瓷罐子，一定要配上雕漆的小盘；
- 3、下层应放雕漆的食盒、吐骨滓方、盘子。
- 4、如果在多宝阁上摆饰 1 套茶具，上层放两只大茶碗，中层放 6 只建盏和 1 个小茶罐，下层放茶釜、风炉、水杓、水杓筒、火箸、釜盖承、清水罐、灰勺、灰帚。

《君台观左右帐记》之所以要对唐物的摆饰做出如此严格的规定，恐怕是由于文化侍从们对堆积如山的唐物不知如何摆置所致。为此，日本人考究出了上述的唐物摆饰方法，笔者称之为“摆饰学”。这种摆饰学是日本人独有的审美意识的物化，它发生于 15 世纪的唐物仕奉官《君台观左右帐记》的作者之一能阿弥，大成于 16 世纪末的日本茶道的大成者——千利休。勿庸说，这种摆饰学是日本茶道形成的主要契机之一。

因为日本茶道的前身是唐物的鉴赏活动，为了近距离鉴赏唐物，点茶与饮茶必须在同一房间进行，点茶人与饮茶人必须近距离接触，由此，点茶的礼法就诞生了。早在 1438 年，日本茶礼的雏形

就已出现。据《南方录》记载：后花园天皇(1419- 1470 年)在足利义教生病时作为慰问品赐给了足利义教3件极品唐物，后被称为“三种极真”。即：1只建盏、1个黑釉茶罐、1个青磁水罐。足利义教病愈后，请后花园天皇来将军府吃茶。这一天，一位叫赤松贞村的美貌武士在将军的命令下用后花园天皇送来的“三种极真”为后花园天皇点茶敬奉。唐物侍奉官能阿弥还为此特地编排了“三种极真摆饰法及使用程式”。“三种极真”被摆饰在一个叫“台子”的双层黑漆茶具架子上，赤松贞村身着礼服，其一招一式优雅流畅。由此，日本茶道礼法之源——台子点茶礼法便诞生了。茶会逐渐演化成为一种以吃茶为契机的行为艺术。

自16世纪中叶起，比起唐物本身，唐物鉴赏过程中的行为艺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比如有一次，武野绍鸥举办茶会时正值瑞雪初晴，树梢上挂满了雪团，如同梨花满树。按规定，茶室里一定要有插花，但武野绍鸥破例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盛满清水的花器摆在了茶室的壁龛里，其名人之举被人们传颂。至千利休，更是把茶会中的行为艺术的创新推向顶点。比如有一次，有人报告丰臣秀吉，说千利休家的院子里开满了牵牛花，好看极了。丰臣秀吉便示意千利休为他在某日的清晨举行一次茶会，以欣赏那满目的牵牛花。那一天，丰臣秀吉兴致勃勃地进了千利休的院子，可是所有的牵牛花都被利休剪掉了。丰臣秀吉不禁恼怒起来：“这不是捉弄我吗？”可是，当他来到茶室时，他发现一缕月光穿过茶室的天窗射在壁龛的花瓶上，在花瓶里，一枝洁白的牵牛花含着露水展示着无限的生命力，丰臣秀吉为此惊呆了。为了此次茶会，千利休剪掉了一片牵牛花而只保留了一朵，这既表现了利休对丰臣秀吉的崇敬之意，又为人们留下了无限的艺术想象的空间。

千利休在茶会上所创制的一系列的行为艺术很快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同并得以推广，与之相反，丰臣秀吉费尽心机猎取来的各色唐物却一路贬值，这无疑引起了这一下霸者的大怒。1592年2月28日，丰臣秀吉赐千利休剖腹自杀，同时也宣告了日本茶道的正式形成。

结 语

综上所述，日本人在鉴赏唐物的过程中习得了审美的情趣，在唐物不足的情势下创制了和物；在唐物鉴赏会演变为茶会的同时，一部分唐物也演变成了茶道具；唐物侍奉官经“茶头”的过渡而演化为茶人；鉴赏唐物的行为艺术终于演化为了茶道艺术。

15、16世纪的明朝朝贡册封外交对周边国家的社会文化均产生过一定影响。其中，日本是接受其影响最深的国家。由于当时的日本社会经济尚不够发达，所以随遣明使东渡的唐物发挥过假性货币的功能；又由于当时的日本尚没有建立自己民族独立的审美价值体系，所以对唐物的鉴赏就成为了日本人审美情趣的孕育过程；还由于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大陆有海域隔离，所以日本人可以用独特的审美标准和方式鉴赏唐物，致使鉴赏唐物的行为艺术演化为了日本独特的茶道艺术。总之，由日本遣明使所带来的唐物对15、16世纪日本文化艺术所带来的影响是中华文明在域外得到弘扬的典范之一。

注释：

[1] 熊仓功夫等：《資料による茶の湯の歴史(上)》，日本：主婦の友社，1995年，第137页。

[2][6] 志贺太郎：《室町將軍家の至宝を探る》，日本：徳川美術館，2008年，第79-107、158页。

[3][4] 小池富雄：《堆朱楊成による唐物漆器の鑑定》，《金鯨叢書 史学美術史論文集》(第26辑)，2000年3月。

[5] 小池富雄：《法界門塗の検討——塗師「羽田五郎」の伝唱を周って》，《金鯨叢書 史学美術史論文集》(第11辑)，1984年3月。

(下转第99页)

(三) 问题与不足

亚历山大的新作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国家支持并参与新地区主义浪潮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全球-地区-国家-国内四个层次的因素中,亚历山大成功地完成了地区与国内层次关联的建立,即证明了印尼后苏哈托时代自由经济与新地区主义之间的共存,亚历山大敏锐地发现了自由经济与新地区主义在消解国家主权中所达成的“默契”。然而,他也忽略这样的问题:

1、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地区机构(东盟自贸区)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中所占的分量,远远不能与东南亚国家和外部发达国家地区相比,因此,这二者之间的不冲突的“共生”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不如说是相互关联并不密切的另一种表现;

2、亚历山大反复指出东南亚地区一体化未来的发展必须要以信息充分、民众主导、多元参与为前提,他认为民众对地区整合信息的不了解以及参与机制的不健全是阻碍区域化的关键。然而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的现实表明,即便可以做到信息充分、民众参与,也无法证明地区一体化与国内各阶层利益是正相关的。我们从欧洲的一体化的实践来看,国家(精英)主导,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推动国家行动的最有效方式。可见,民众主导的国家转型也许的确可以更加促使主权的瓦解,但是民众主导的地区整合进程可能未必比国家主导的进程更加顺利,而且行之有效。笔者认为,亚历山大所提出的地区化一体化方案有如东盟宪章中“推进民众导向的东盟,鼓励社会各阶层参与东盟的整合与共同体的建立,并使他们从中获益”的原则,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这一原则?这也许是未来若干年东南亚地区国际政治经济实践需要解答的问题。

总之,尽管该书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尚未很好解答的问题,但是仍旧不能掩饰其中的智慧亮点,很明显,亚历山大对东南亚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推进。

[责任编辑: 司 韦]

(上接第 96 页)

[7] 家 智子:《山科家今西宮をめぐる 诸问题——「相阿弥书状」を手がかりに》,《芸能史研究》(158号),2002年7月,第57页。

[8] 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1页。

[责任编辑: 司 韦]

Kango Trade and the Naissance of Japanese Tea Ceremony

TENG J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Represented mainly by Japanese Tea Ceremony, the unique Japanese aesthetic perspective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art. We can rarely see studies about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is aesthetic perspective, while the few Japanese domestic articles mainly concentrated on its relation with the Japanese Shinto religion. The following pages attempt to examine the process of Japanese Tea Ceremony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Sino-Japan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 the Kango trade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and Chinese goods' influence on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Key words: Kango trade, Chinese goods, Higashiyama Royal Object, Japanese Tea Ceremony